

總理倫敦被難紀

中國國民黨天津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印



總 理 遺 像

總理倫敦被難紀念冊

目 錄

總理被難的經過和紀念總理的意義

紀念總理想到總理死後

倫敦被難記

韓 天 錫

中山先生遺著

總理倫敦被難的經過，和紀念總理的意義

(一) 被難之經過

總理所領導的革命黨於紀元前十七年（光緒二十一年，即西歷一八九五年）九月九日，在廣州第一次失敗以後，革命同志犧牲流血者七十餘人，多年慘澹經營之革命計劃完全洩露，此石破天驚之偉舉，使總理之名由官書報紙而遍傳海內外，清政府及其家奴更震恐不能自安，思得總理而甘心，總理以國內既不可留，乃以收拾殘局之責委同志，徐圖再舉，已則易服斷髮作海外之宣傳，期激厲國人邀集同志，以擴大革命之勢力，所至瓊島美洲，莫不努力鼓吹，感召極衆，清廷忌之益甚，翌年離美赴英，即有駐美公使楊子通，先期密電駐英公使龔照瑗設法逮捕，龔因與參贊馬凱尼謀，用粵人鄧廷鏗誘總理至使館而閉之，將計日趁輪密送中國治罪，使館防範至密，聲氣隔絕，外間莫知消息，勢殊危迫，先是總理有業師康德黎者所居與使館至近，總理未遇難時常相過

從·至是卒以館役柯爾之力，投書康氏，柯爾之妻，尤爲盡力，亦以使館陰謀告，請速營救。康氏奔走殊苦，不得要領，後就商于其友孟生博士，適柯爾來，因得詳情而投書泰晤士報，更與警察交涉，搜索馬凱尼住宅，派探看守使館及開往中國之輪船以防他變，又將各情投訴外交部作正式交涉。一時輿論大譁，抨擊極厲。國際法律學家楷文特畫，荷蘭學士，胡特，思比克報，香港支那郵報，泰晤士報，均先後著論攻擊，謂爲違反國際法律，侵越英國主權，破壞國際成例，必引起國際交涉。英政府遂不能不於此案加以重視，因與清公使交涉，卒于二十三日正午與康德黎先生及外交部之偵探長同離中國使館。計自十月十一日至是凡歷十有二日。總理爲中華民族苦鬥而身受之危難始告一段落。以後國民革命之新意向與新努力又在他的領導下，作蓬勃不勦之進行，而造成今日之中華民國。

(二) 紀念的意義

一、我們要紀念 總理的獨往獨來，止知民衆樂利，不惜個人危難，爲民衆而奮鬥，

爲民衆而犧牲的大無畏精神。我們要紀念 總理以堅忍不拔的毅力，機警明敏的手段，而戰勝一切困厄與危難，厚植本黨的根基，締造今日民國之功績，

二、我們紀念 總理，不要忘却了他的博大慈祥的人格，光明磊落的事業，能使國外人士予以深切之同情，使當年帝國主義者不能因此而忽視，一切侵害之企圖，都在他的不動聲息狀態中消失了。此在當時各報評論中所指示，直到現在尙值得我們矜式與警省的。

三、我們紀念 總理，不要忘記了我們目前不斷的有明槍暗箭的敵人；更其不要忘記了那些日居左右，貌似溫恭，止圖私利，害黨害羣的鼠輩。本黨現在風雨飄搖的不幸狀態中，他們直接間接都在發縱指示着一如 總理當日身受的情形，我們要揭破他的假面具而毫不猶疑地鏟除他。

四、我們要認清 總理的被難是反抗腐敗政府，卑劣官吏，必然的結果。在這短短的一段爭鬥史中，可以看出反革命勢力之時時如影隨形地跟着革命勢力拚命的與他爲難。

而這革命勢力不是因而得到充分的反抗能力予革命前途以長足的進展，便是因受不了此種打擊而夭折或屈伏，這全視我們能不能本着總理當日的精神去努力，而全靠我們去奮發自勵

五、我們要認清 總理的被難時期正是總理一生革命事業開始突飛猛進而入予光明之域的時候，以後一切之成功都以此為極有價值的保障，總理的革命勢力都以此為發軔的基點，他所領導的革命黨人都在這旗幟之下而風起雲湧起來，當此軍政告終訓政開始時期的一新階段我們對此紀念日應具何等之信念與努力！

六、我們要紀念被難的總理，要知道總理一生無時無刻不在此種被難狀態中為我們爭自由爭人格，在此追懷先烈的無限悲思中應具如何決心去確守他的遺訓遺謨與發揚光大他所手創之民國，完成我們的重大責任，我們迴溯當時本黨勢力的微薄，環境的惡劣與總理不屈不撓之願力，更當一致奮起以致力我們偉大的事業，最後我們要高呼：

(一)總理精神不死！

(二)紀念總理要繼續總理奮鬥犧牲的精神！

(三)紀念總理要學總理機警敏捷的能力！

(四)紀念總理要擁護他所艱難締造的本黨！

(五)紀念總理要實現他所提示倡導的三民主義！

(六)中國國民黨是總理留給我們的遺產來建國救國的！

(七)我們要繼續總理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精神！

(八)三民主義萬歲！

(九)中國國民黨萬歲！

(十)中華民國萬歲！

紀念總理想到總理死後

韓 天 錫

(一)

總理在倫敦被難，幾乎遭了不測，幸賴總理以機警明敏的手段，才脫離了危難；現在

又到總理被難的紀念日了，使我們發生無限感想！

總理被難的始末，和紀念總理的意義，已經另有文章說了，我要說的是紀念總理使我得到的感想。我覺得每逢紀念總理，總理便「宛在目前」我們見到總理的遺容，想像到總理的人格，便使我們警惕！便聯想到我們的革命事業，是否按着總理的遺教去行，我們對於革命工作不努力，對起總理對不起？

總理使我們可欽佩之點太多了，我們的確分不出那點是讓我們最欽佩。人人都知道總理有大無畏的精神，博大慈祥的人格，堅忍好學的精神，數十年如一日的革命歷史，不過總理談到革命，使我們刻在肺腑的有三點：

1. 總理感覺到革命不成功，是由於封建餘孽的官僚武人來破壞；

2. 革命不成功，由於革命的力量渙散；

3. 革命不成功，由於假革命黨冒革命之名來升官發財？

關於第一點：我們知道自從總理讓政於袁世凱後，袁世凱便圖謀不軌，毀棄約法，解

散國會，欲帝制自爲，而一般滿清官僚，囿於舊習，亦復視民國如仇讎，都想借袁世凱是的力量來傾覆民國，袁氏死後，繼起的便是禍國的北洋軍閥和一般無賴政客，如安福官系，研究系，交通系等，政客和武人，互爲利用，政客搶官作，軍閥搶地盤佔，什麼革命，什麼是爲民衆謀幸福，他們完全不懂，所以總理常憤憤的說：革命的成績，都給僚武人破壞了！

關於第二點，是總理最痛心的！我們知道革命的成績都給官僚武人破壞了是不錯的，但是我們仔細想想，官僚武人怎麼能够破壞革命？我們不能不歸罪於我們革命黨的力量太薄弱，不能和官僚武人對抗，如果我們黨的基础鞏固，黨的組織嚴密，官僚武人絕不會出現，也絕不會有破壞的陰謀，總理常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革命黨也是一片散沙，中國人太自由了，革命黨也太自由了，總理覺得革命失敗，這是一個大原因，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致訓詞說：

「：：從前本黨不能鞏固地方，不是有什麼敵人用大力量來打破我們，完全是由於我

們自己破壞自己！是由於我們同志的思想過於幼稚，常生出無謂的誤解，所以全黨的團結力便非常渙散，革命常因此失敗，我們以後要團結一致，第一要犧牲自由，第二要貢獻能力，如果個人能够犧牲自由，然後全黨方能得自由，如果個人能貢獻能力，然後全黨才能有力量，等到全黨有了自由，有了能力，然後才能担负革命的大事業，才能够改造國家，以前的失敗，是各位黨員有自由，全黨無自由：：」

總理在十三年改組的時候說：

「：：此輩反革命派，即舊官僚，一方參加革命黨，一方破壞革命黨，故把革命事業弄壞，實因我們方法不善，若有辦法有團體來防範之，用對待滿清之方法對待之，則反革命派當無所施其伎倆：：然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於方法未善之過！使反對革命派能乘隙以入，施其破壞而不覺，雖致失敗，尚不知其所以失敗之緣由，若當時有辦法有團體先事防範，繼續努力奮鬥下去，建設起來，則祇須三年之時期，其效果已頗有可現，決不如今日之一無成績：：俄之反革命派，並非真正不及中國之反革命派

之聰明利害，且百倍過之，特俄國革命黨之聰明利害，又百倍過於彼輩耳！中國之革命黨經驗不多，遂令反動派得盡至技，沒有俄國那種好方法以防範反革命派，使其不能從中破壞」

關於第二點，總理更爲傷心！我們見到許多革命同志，在中途投降的投降，變節的變節，官到手，立刻就現露出他的獐狻的面孔，甚而至於破壞革命，總理說他們是「假革命黨」總理說：

『革命成功後的「假革命黨」，借革命來圖個人的私利，借革命一條路來作終南捷升官發財，自從革命成功後，這「假革命黨」充滿全國，冒革命之名，所以把革命成績都破壞了，往往令國民不知道革命黨是做一種什麼事，所以國民看到現在這種「假革命黨」，以爲這就是革命的人才！』

(二)

我們知道總理離開我們了，總理不能再親自出來領導我們來革命了！前途失了光路的

燈，我們是何等痛苦呢？我們覺得我們不應該這樣的悲痛，因為總理雖然死了，有他留給我們的遺教，有他留給我們的黨，我們每天讀總理遺教，便覺得總理如在，我們一日有黨，便是總理不死！

總理死後我們的黨怎麼樣呢？我們知道自總理決心改組以致改組成功，給本黨扎下了根基，總理死後，本黨膨膨勃勃大有「一日千里」之勢，不久廣東便統一了。

統一廣東以後，不久便出師北伐，由廣東而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河南，山東，直隸，直到現在，算是統一了中國，在這個過程之中，有兩件事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是共產黨的搗亂，一個是腐化分子的竊位。

十三年改組，容許中國共產黨以私人資格加入本黨，完成國民革命，在總理未死以前，共產黨徒，莫不唯總理之命是聽，絲毫沒有背叛本黨的痕跡，自從總理死後，共產黨便猖獗起來，鮑羅庭不顧中國客觀的事實，唆使共產黨徒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鼓吹階級鬥爭，等到他們的羽翼漸豐，便有篡奪本黨的陰謀，幸賴發覺較早，武漢和南京便雷

厲風行的清起共來。

自從清共以後，不到幾個月，共產黨便一蹶不振了！爲什麼事先共產黨那樣的猖獗，而清除的這樣快呢？因爲他們不顧客觀的事實，只顧把整個的蘇俄式的革命整個搬到中國來，而中國並沒有形成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所以共產黨的一舉一動，都是製造階級，好引起他們的鬥爭，這就是周佛海同志說的「在未出嫁之前，先學養兒子」是一樣錯誤！

共產黨在中國失了民衆的同情，於是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在中國演起殺人放火的把戲來，有兩樁事實，足以亡共產黨在中國政治上的壽命：一是南昌葉挺賀龍的叛變，一是廣州的事變，有這兩種事實，共產黨「流寇式的」面孔，給了中國民衆一個深切的認識。因爲分共問題，引起了本黨極大的爭端，在武漢的同志都主張尊重黨紀來分共，在南京的同志都主張以革命手段來分共。自此以後，雙方同志，互相獵疑：南京方面的同志說武漢的忠實同志是共產黨進共產黨，武漢方面的同志說南京方面的同志反動，這都是不

掩的事實。

及至雙方都覺悟了，要竭誠合作了，正當這個時候，有一般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後除名的黨員，乘机大活躍，他們自誇於人的就是他們反共的先前輩，當時總理容共他們都不贊成，但是我覺得反共是一件事，革命又是一件事，不能說是反共的就是革命的，如果反共就是革命，張作霖也曾討赤，何嘗不是革命同志？所以汪精衛同志說：「自從武漢發現了共產的陰謀以後，凡是國民黨的忠實同志，沒有不反共的，但是不能說反共的就是革命的！」如果以反共老前輩自居，那麼總理都不如他們了！

自從這些不肖份子活躍起來之後，在黨政上拿到了權，組織了一個個在黨綱裏沒有的特別委員會，裏邊差不多都是本黨不肖份子，忠實同志則裹足不前！

特別委員會會的政府，組織成功以後，引用的都是些腐化分子，甚至反動勢力之下的官僚政客，無不應有盡有，很惹一般忠實同志的反對，南京開慶祝唐勝利大會的時候可，市民提出「打倒特別委員會」的口號來，而特別委員會當局亂加以搗亂名義，向市民

開槍，死傷的很多！

本黨忠實同志羣起反對特別委員會，特別委員會，事實上不能不取消，至開四次執監會議時，特別委員會方才結束了

(三)

四次會議閉會後，決定繼續北伐，日本爲保持已得的在華利益起見，決計出兵山東，及我軍到山東時，雙方大起衝突，日兵在山東橫行霸道，爲所欲爲，當時政府外交方針，決採和平手段，而日本仍一步迫近一步。

我們知道日本在山東演的濟案，是中國的奇恥大辱，更是革命史上的莫大污點，因爲本黨的外交，向採革命方式從來沒有屈服過任何帝國主義。

我們知道本黨爲什麼一定採革命方式的外交呢？因爲帝國主義是侵略他人的，我們愈軟弱他們愈侵略，若想用和平手段辦理外交，來感動帝國主義促其覺悟，不但事實不可能，而且近於滑稽！何如呢？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的砲艦政策，背後是經濟的背景，如

果他們找不到銷貨場，生產過剩，便發生極大的恐慌，我們希望他們可憐我們不要來侵略我們，但是他們覺得侵畧我們是他們唯一的出路，我們如果打算反抗帝國主義，惟有拚命和他們去鬥爭，絕不是口誦「仁義道德」，坐念「阿彌陀佛」所能感化的！

本黨的勢力，僅在廣東一隅的時候，內受反革命派的種種摧殘，外受帝國主義的種種壓迫，所處的環境，是何等惡劣，但是始終澈底反帝國主義，省港罷工，香港幾乎成了荒島，英國帝國主義者大起恐慌，同時廣東政府加了二五附加稅，煤油也加了價，帝國主義者屈服於我們了！北伐軍到了武漢，借民衆的力量，作收回英租界的運動，結果英租界收回了，帝國主義者屈服於我們了！

我們再從反面來証明，從前北京偽政府開的關稅會議事先大修馬路，粉飾牆壁，費了許多錢，結果得不到列強的同情。這次濟案發生，所謂和平外交出現，一方面極力制止民衆運動，勸告民衆忍耐鎮靜，一方面提到列強組織的分贓機關「國際聯盟」裏面去訴苦，結果我們只見日本帝國主義者仍然繼續在山東行凶，見不到列強的同情，不但不同情，